高州民革二三事

甘锋

（一）

1983年12月，高州民革成立。

早期，加入民革组织的成员，多与原中国国民党、或民革组织、或“三胞”（港澳同胞、台湾同胞与海外侨胞）有亲属关系。做好“三胞”及其在大陆的亲属的工作，促进祖国统一，是民革的一项主要工作。高州是一个台属人数较多的县市，据2005年统计，排广东省第二。

改革开放初期，“三胞”对祖国政策不了解，回乡探亲存在各种顾虑。高州民革成员通过书信，向“三胞”宣传祖国政策，邀请回乡团聚。1987年，高州民革党员与“三胞”往来330多次。经高州民革党员邀请回乡探亲的“三胞”，很多都是第一次，他们有的已离开祖国大陆30多年，回来后目睹祖国及家乡的变化，感慨万端，与亲友执手相看泪眼。1988年年底，返回高州探亲的台胞达900多人。

加拿大华侨张述武先生应高州民革党员黎宗瑚邀请，回高州观光探亲访友，了解投资环境。张述武参观了高州城西缅茄树，并在树下拍照留念。返加拿大后，在蒙利尔市《华侨时报》用半版篇幅刊登缅茄树照片，介绍此珍稀缅茄树的历史及国家政策。回乡之行，激发了张述武建设祖国建设家乡的想法，他计划投资开设手套厂，解决200多人就业，因那时高州交通落后，张述武后来选择在深圳市布吉镇和东莞市桥头镇各开设了一千多工人的手套厂和成衣加工厂，并委托茂名市制衣厂加工。

1996年，高州举办盛大的冼夫人诞辰节，黎宗瑚借助加拿大华侨对冼夫人的崇敬心理，于1997年3月1日撰文在加拿大《华侨时报》发表了《南粤大地再现冼夫人》一文，除了报道冼夫人诞辰节的盛况之外，还借此介绍了高州改革开放的成就，突出宣传了高州农业发展，尤其是荔枝、龙眼、香蕉等水果的种植情况，增强了加拿大侨胞对祖国对家乡的热爱之情。

例子还有很多。

港商翰逸峰先生应高州民革邀请，五次到高州商谈，投资250万港元购买三十台运输汽车与集装箱设备，开办高港联合运输公司，并在深圳蛇口挂牌。

民革成员龚侠祥与居港亲人联系邀请台商到高州投资高岭土加工及冰冻海鲜出口，龚侠祥还通过书信发动旅居国外人员为家乡筹建小学捐资。

香港同胞吴竞芬、吴雪琴妯娌两人应邀回乡探亲，民革成员吴永玉接待她们，并陪同她们回高州大坡镇省亲，增进她们对家乡的了解，激发思乡之情，临走时她们捐款资助家乡的公益事业。

（二）

民革是孙中山先生爱国思想、革命意志和进取精神的追随者。

为缅怀孙中山先生的历史功勋，1986年11月12日，高州举行系列活动，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20周年。

高州人民大会堂展出163幅孙中山先生生平照片资料。参观者川流不息。县城13间学校师生集体参观，队伍长达三四百米，不少师生边参观边作笔记。

高州“孙中山纪念堂”举办孙中山学术报告会，各级党政有关领导、各民主党派、搞学术的、社会知名人士、中大校友，等等，济济一堂，座无虚席，所作报告长达三个半小时。活动还编发了纪念专刊。有民革党员撰了一首诗，题为《愿海峡两岸洒满爱》。

整个纪念活动持续八天，参加人数达一万一千一百多人次。活动规模之大及影响之广泛，为解放以来之最。

2000年秋，为配合民革广东省委会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暨孙中山先生诞辰135周年编印《孙中山在粤史迹》一书，高州民革党员多次走访了高州孙中山纪念堂、高州中山公园、高州一中（原德明中学），还搜集影印了《任命熊英职务令》等资料。

2000年，高州举行辛亥革命纪念会，时任民革高州总支部主委熊捷在会上发表了《发扬辛亥革命传统，争取祖国早日统一》的讲话。

2008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的纪念日，孙中山先生孙女孙穗芳博士到高州访问。孙穗芳给高州赠送了其亲笔书写的“博爱”“天下为公”两幅书法作品及其主编的《国父孙中山先生纪念集》。

为寻访民革前辈足迹，高州民革多次组织党员到孙中山故居、李济深故居、蔡廷锴故乡，以及重庆、武汉等地的纪念场馆，开展“观故居，走多党合作之路”活动。

（三）

民生主义即博爱，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要旨之一。为继承和发扬孙中山民生主义思想，高州民革致力教育事业，做到“有教无类”。

上世纪80年代，适龄青少年入学率不太高，当时国家对教育的投入不高，高州民革决定把教育作为服务社会、服务民生的切入口，1986年8月，成员集资接办了私人开办的位于高州城区北街菠萝步的育新中学。民革党员黎宗瑚任第一届校长，育新中学成为高州民革主办的具有党派办学特色的一间全日制普通中学。

起初，资金、师资、后勤等方面困难重重，校长带头领最低工资，后来又把领到的工资资助生活困难的教师，校长、主任等校领导甚至亲自动手砌炉灶、修课桌，节省一切不必要的开支，县委统战部、镇政府也给予大力支持，渡过了最艰难的一段时期。

一年后，学校由接办时20个学生发展到180人，1987年学生达到320人。随着生源的增加，校舍设备不足又成了新的问题。1987年12月，民革茂名市委会将租到的茂南区金塘镇车田坡原南油测井大队旧指挥部的48间闲置砖瓦平房及空地，转租给高州民革继续办学。

1988年5月30日，学校定名为茂名市育新中学。

1988年秋，高州民革成员黄慰涛、吴永玉、吴济中来到学校开展改造工作，他们看到校园杂草丛生、树下蚊蝇成群、室内蛇鼠痕迹显现，而且缺水缺电，天气酷热，条件十分恶劣。不管怎样，三人仍排除万难、争分夺秒筹备秋季开学各项工作。购材料、搞装修、改校舍、添设备、聘教工、招学生……时间紧，任务重，人手由3个人增加到5个人，仍然忙不过来，教工亲属包括探亲的学生也参与帮忙，和木匠泥水工一起夜以继日工作。有时连吃饭也没时间，就随便吃点干粮应付，眼困了就打个盹，还经受日晒雨淋、蚊叮虫咬等各种困难。

通过一个多月艰苦卓绝的奋战，一个宽敞整洁、林木苍翠、环境优雅的校园展现在人们面前。6间能容纳七八十人的课室、30多间宿舍、干净明亮的厨房和设备、200多套课桌条凳……还打了一口三眼水井，解决了用水困难。

大家不敢相信，校舍修缮进展如此神速，改造力度之大，学生及家长慕名前往参观，交口称赞。招生旗开得胜，430名新生，分6个班，高中4班，初中2班，9月开学时仍有学生络绎不绝报名，因校舍限制，只好作罢。

学校所招收的学生多是无校可读的低分生，虽然做到了有教无类，但也曾给学校的教学秩序带来一定的冲击。有学生结交社会闲散人员，常跨墙出没于校内，时而在教室窗外干扰，甚至对学生敲诈勒索殴打。学校为此加高了围墙，墙上插上了玻璃碎，防止坏人出入校园为非作歹，并与隔壁玻璃厂老板商议，玻璃厂和学校各雇佣一名民警，共同维护保卫校厂治安，联防联控。学校还加强自卫，成立了护校队，教师和有武术基础的高中学生及校警一同做护校工作，一次又一次驱逐外来干扰，同时对内劝退屡教不改的学生。1990年秋，学校又聘请一位当地有名的武术教头任该校武术教师，兼保卫工作，另外聘请当地派出所负责学校的治安管理。自此，学校成为了秩序良好、纪律严明、学风优良的好学校。

为了纪念孙中山先生和突出民革特点，1988年更名为“茂名市中山中学”，每年11月12日为校庆日。

1990年底，茂名市中山中学在校学生达670人，共11个班，分高中8班、初中3班。学生来自茂南区各镇，公馆、金塘、镇盛、鳌头、袂花等镇较多，其他各镇及高州、化州、电白等县亦有少数，学生大多数是工农子弟，占学生总数的91%。

中山中学校风严、学风浓，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人们传颂该校下课半小时仍有大半学生留在课室里自觉学习，教师也是常常备课、批改作业至深夜，潜心教学。学生成绩低进高出，办学势头越来越好，各种荣誉接踵而来，得到省市县各级教育部门给予肯定，办学经验得以推广。

除了育新中学、中山中学，高州民革成员还创办了潘州新时代学校、育英中学等学校。高州民革成员龚侠祥任潘州新时代学校校长，他后来出席了全国民办教育工作会议。高州民革成员梁洲、卢丰时等集资合办了石鼓育英中学，高州民革成员黎宗瑚任高州镇南中学校长，高州民革成员吴树明创办了高州新街中学，高州民革成员江友坚联系在台宗亲江汉君先生回乡开办大井镇祖诚中学，等等。

高州民革成立以来，有一半多的时间，一直发挥成员的文化优势，开展社会力量办学。目前，高州民革101名党员里有74名教师，他们默默耕耘教坛，教育教学成绩突出。熊捷同志是他们中的佼佼者，他在高州三中任教时，创办了《新地》文学社作为语文教改基地，县长亲自题词“新花竞放、新地常春”，著名作家冰心老人也来信鼓励。

乱世悲歌（上）

——一个九旬老人对日寇侵华的亲历回忆

林发海 撰述 刘经国 整理

我生于1932年2月1日，也就是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年。父亲林长炳（又名林慰卿）在李祥兴杂货店当店员，母亲林黎氏在家摆摊做小生意。几年之后，我家先后增添了两个妹妹，大妹林发俊（小名桂兰），小妹林如兰（小名幺儿），加上哥哥林发权，全家共6口人。

安 居

我家位于荆门县城关枣园街上四方口子下侧（现为东宝区龙泉街办团结街）。房屋坐西北朝东南，房前是枣园街（团结街），屋后自有一块斜坡地（约3分地），地里还有原房主的两个祖墓。再后面是菜农的菜地，菜地后面是一条小河（现为龙泉公园的无名河）。我家的东边是鲁家，西边是张家。

我家是一座五进五出院子，宽约9米，纵深约55米。房屋石木结构，松木房架、檩子、瓦条，石块、石灰和粘土混合山墙。墙外青黑，墙内灰白，顶盖传统灰瓦。

院子第一进是三间并排门面房，每间宽约3米、深约5米（后面四进房间面积皆同），房间是黑土地面。中间房是大门和人行通道，两边房各有一个铺台，用来摆放日用百货，母亲做点小生意。从中间门进去是天井，天井四周是小腿高的台阶，地面铺着块石。天井左边厢房是厨房，右边厢房是杂物房。从天井往里走，第二进正中是堂屋，堂屋左边正房住的是奶奶和姑婆（两位老人很早去世），右边是父母住。从堂屋往里走，是一个空场地，左边种有牡丹等鲜花，右边种有桔子等树木。这两进两出供我们自家使用。

从场地往里走，第三进正中是堂屋，两边是东西正房。从堂屋再往里走，正中是天井，天井两边是东西厢房。第四进与第三进结构完全一样。从第四进天井往里走，第五进是一个大屋，里面空着。从大屋往里走，右边是一大块空场地，左边一侧靠南是猪圈，靠北是厕所。这三进三出用来出租。

靠着门面小店、房屋出租和两块田地，我们一家人过着平静而安详的生活。

出 逃

1938年，正当我进入学龄期，准备上学读书之际，日寇把战火燃烧到荆门。11月，日军先后出动飞机百余架次，对荆门城区狂轰滥炸。城区除枣园街（现为团结街）、三里街（现民主街）、南门内的极少部分建筑外，整个城区主要建筑基本被炸毁。城区不是久留之地。父母经过一夜合计，忍痛舍屋弃田，向西向北逃亡。父亲小小个子，挑着一担箩筐，一头是幺妹，一头是炊具；母亲迈着三寸金莲，背着一大包衣物；我和哥哥、大妹各自背着自己的换洗衣物，漫无目的地四处流浪。

我们先逃到石莲人娃子沟李清海家。李清海经常到城区赶集，在杂货店买东西时认识了父亲。我们刚住下来，父亲抱着侥幸返回杂货店，希望能够保住家人生计。没过几天，日军发动更加猛烈的轰炸。母亲不知父亲生死，担心天有不测，整天伤心哭泣。后来，从难民中听到消息说，有人看见在大轰炸后，父亲满身灰尘，从俑壁（小南门正前方约一百多米处一堵高墙，民间传说挡邪的）后面逃出来，杂货店也被炸毁。生意做不成，父亲只好逃回石莲，带上全家跟随人群继续流浪，先后逃往姚河、栗溪等地。1938年底，我们反转逃回烟墩集安团（团防所在地，现为栗溪镇尖山村），从此借住在陈学炎家里。

陈家位于一座小山脚下，家有老两口子和一个儿子（就是陈学炎），一个童养媳（姓陈），一共四口人。当时，我称呼老人为陈大爹（不知名字）和许妈，叫他儿子陈学炎为陈大哥（比我大5岁），叫童养媳为陈四姐（约11岁，在家排行老四）。

遇 险

尽管陈家人各方面照顾我们，但是还是遭遇到好几次险情和困境。1940年农历五月初一，从东北面圣境山方向，突然传来嗡嗡的飞机声，声音由小到大。在城里被炸怕了，一听到飞机声响，我们就疯狂向外飞奔。准备通过稻场，下到河沟，穿过小溪，躲进对面大山丛林中。但是刚过稻场，飞机就飞临头顶，我们只好顺着地势，躲到稻场下坡的岩壁边。岩壁2米多高，顶上是茂密的荆棘杂草，下面是窄浅的干简沟。上面阳光普照在明处，下面杂草丛生在暗处，所以从上往下看不到，从下往上看得清。我们一家人贴着岩壁，屏住呼吸，目不转睛地注视上面，竖起耳朵闻听动静。

不一会，就听见行人的脚步声。我往上一瞟，只见一队日本兵，脚蹬浅黄色牛皮鞋，在稻场前小路上，从右往左，一字排开。为首的斜举太阳旗，后面的背着枪，枪刺上闪着寒光，还有的扛着机枪。几十个日本兵走过稻场，收尾剩余两个，一个拎着个壶，先后向陈家大门内和尹婆婆的小偏房泼油（后来猜测可能是煤油），另一个跟着点火，两座房屋立刻起火燃烧。

我们心里很急，心想：这下可完了。等到日军走远后，我们急忙从草丛中钻出来，只见陈家已在全力灭火。原来慌乱之下，陈家往后跑，我们往前跑。日军离开时，他们看的更清楚，所以第一时间冲出来灭火。只见陈大爹只身上房下瓦，其他人有的帮忙接瓦，有的提水浇火，有的用扫把或树枝扑打，大家齐心协力，终于将火扑灭，避免了更大灾难。

后来得知，凡是日军经过的地方，都要烧光杀光。阴历五月底的一天，从外面传来消息，说日军又来乡下扫荡（乡民称之为打闹）。父母害怕极了，慌乱中拿了几件换洗衣服，带了一包炒米就往外逃。在沿着山路乱转时，偶然发现一个隐蔽之处，就把我们躲藏在里面。

这个地方位于一个山沟中，上面大树参天，枝叶遮盖严严实实，下面有个小空间，可以供六人容身。下雨这里行洪，平时这里没有明水。天慢慢黑下来，尽管是夏天，山里白天凉快，夜里也很冷。父母用被子把我们四人围住，慢慢地我们兄妹四人睡了，他们却不敢大意。当时山里野豹出没，常有伤人传闻。他们一人拿着一根木棍，整夜守护在门口，生怕野兽伤害我们。在这个不见天日的山沟里，我们整整躲藏了三天三夜，随身携带的一点炒米早已吃光，外面没有任何确切的消息，联想到日军暴行的传闻，我们还是不敢轻易回家。饥渴交迫之际，父亲趁着夜色，拿着我们的棉衣，小心翼翼地摸到山下秧田，将棉衣浸湿，再带回山沟，拧出水来给我们喝，我们早已饿得奄奄一息。

另一边，陈大爹和许妈熟悉地势，消息灵通。他们知道安全后，提前回到家里。知道我们几天没有回家吃饭，就为我们做好可口的饭菜，有白米饭、炒鸡蛋、蒸腊肉等，让陈大哥送给我们吃。因为地形不熟，陈大哥转了几圈，也没能找到我们，便将饭菜原封不动地提回家。陈大爹见状说，他们一定就在附近，不会躲得很远，哪有找不到的？转身带着陈大哥，将饭菜重新提上，辗转山上山下，终于找到我们的藏身之处。我们全家这才饱餐一顿，躲过了生命的一劫。

（未完待续）

特殊年代特别的父亲

王崇宁

我的父亲叫王松元，他为人和蔼，勤劳能干，处事雷厉风行，默默奉献却从不求回报。

记忆中，在上个世纪，作为老党员的父亲一直担任生产队长（村长），他常常光着膀子，腰扎汗巾，弯着古铜肤色的身躯，带领社员们战天斗地，解决大家的温饱问题，此外，还带领群众开山凿石，开劈出一条宽约3米、长约3公里的“阳光大道”，方便村民赶集和孩子们上学。七十年代，还在村口建造了一座小型水电站，村民们不仅不用长途跋涉去碾米，晚上还可以享用发电照明，这在当时落后的山区是极为罕见的，而父亲肩负重任却没拿过任何报酬。

我是八十年代走上教师岗位的，后转行到行政部门工作。每每与父亲在一起，他总是语重心长地教导我要忠于党忠于人民，做事一切以德为先，要有奉献精神，多为人民谋利益。闲暇时，父亲还会给我讲他以前背枪行军，到思贺、合水等地去伏击土匪，打地主劣绅，协助农村搞土地改革等故事。至今，我依稀记得曾有几个军人到过我家，桌面上摆放着手枪、步枪、冲锋枪和大刀等武器，那时解放军叔叔说：小孩子别靠近，枪会走火的。好奇又害怕的我，最终没有深究父亲的故事。后来随着年龄增长，慢慢回味，也只是觉得父亲当时应该是个地方民兵吧。

2017年5月，身患癌症的父亲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弥留之际，他反反复复提醒我做人要对党忠诚，党叫干啥就干啥，要做有益于人民的人；回光反照那一刻，他突然艰难地抖动手指，拼尽力气断断续续说了三个字：箱……箱……箱。我想，父亲一生清贫，从没听他说过有什么宝贝的呀，可他为什么会连说三个“箱”字呢？

后来我清理父亲的遗物，也真没有发现什么宝贝。十多天后，妹妹回来帮忙清理，她在我老妈的一个行嫁箱（以前的姑娘出嫁时，娘家会备个织布的工具箱，因为那时需要用人工织布缝衣服给孩子穿）中找到一本国防部长彭德怀签发的军人证——这可真是个宝贝啊，它见证着父亲的丰功伟绩！后来我问母亲，为什么不告诉我有这样一本证书。母亲说她不识字，也没听父亲提起过，哪知道是什么呢。至此，我突然明白：父亲这样做，是不想后辈躺在荣耀本里啃国家的财物啊！

后来我拿着这本证书到市民政局了解相关情况，工作人员接过证书，瞪大眼睛盯着我，责问我为什么不早拿来登记。他说这是军人在特殊时期特有的，刚解放时百废待兴，那时还没有武装部，兵役局招些军人去抗美援朝，也招少部分在当地保卫解放成果，亦军亦农，一来打击国民党的残余势力，二来协助做好土地改革等工作。他还说：这批老军人是省直接发工资的，早在九十年代初期就下发通知到各管理区（现村委会）做好造册登记，那时属于农村户籍的都有五六百元一个月工资，现在已升至近二千元。而你这个从没申领过，真是太可惜太可惜了，如果你父亲现在还在世，那就立即录入系统补发工资，并把证件报省审核。我说这证书是我父亲去世后才发现的，那个工作人员再次扼腕，说若是早来登记，死后还会补发半年工资给家属予以援助的。

我的老党员、老军人父亲安祥地走了，没有留下任何遗憾。他的一生，信念坚定，埋没名利，为民奉献，处处以党员、军人的优秀品质来服务社会，以传统美德来熏陶后代。父亲，当您的儿子，我自豪！我会踏着您的脚印扎实前行：克己奉公，无私奉献！

茂名印记

送师傅返抚顺

1961年，茂油公司页岩干馏如芳庐开汽，东北抚顺石油一厂有一批师傅到茂名指导开汽，其中有15人到油厂原矿车间。开汽成功后，这批师傅要返回抚顺，原矿车间职工依依不舍。曾在抚顺石油一厂当过学徒的职工想请师傅到饭店吃餐饭，但那时买饭要粮票，最后大家决定到茂名照相馆合影留念。图为前排和二排左1至左5是抚顺石油一厂师傅，其余是原矿车间青工。

（陈桂豪）